

布尔塞维克

第三卷

(第一期至第六期)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
第二期

合刊

目錄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出版——定價大洋一角

大變化之一年

史達林

軍閥混戰和汪精衛

瞿秋白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李立三

反對派對於中國問題的錯誤

吳良賦

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

秋白

太平洋勞動婦女運動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楊之華

國際共產黨反右傾的爭鬥（續）

亮萍

大變化之二年

史達林

——蘇聯五年計劃之第一年的成功

在過去的十二個月中社會主義發展各方面都起了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是緊跟着社會主義向城市和鄉村中資本主義成分積極進攻的形式來的。這一進攻的特殊之點就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主要範圍之內，已經引起了一貫的確定的成績。這證明黨善於利用新經濟政策初期的讓步，爲的是組織後來的變化，爲的是在進攻資本主義分子上可以得到勝利。

經濟建設上所達到的成功，由下列三方面看出來。

第一、我們在勞動生產力上已有了決定的變化，在社會主義建設前線上數百萬工人們所表顯的創造力和極大的熱誠，便是明證。

羣衆所表顯的創造力和熱誠在這三方面發展着：一、以自我批評對官僚傾向鬥爭，二、以社會主義的競賽對躲懶，怠工，和破壞無產階級紀律的人們鬥爭；三、以不間斷勞動週（蘇聯已廢除星期日休息的舊制，工廠的工作是不停息的，但是工人每工作三四天以後可休息一天。）的組織對工作的舊例和落後鬥爭。結果是：在勞動前線上得到很大的勝利，全國數百萬工人都表現出熱誠和互相的鼓勵。這種成功的意義真是不可

計算的，因為只有工作的推進力和數百萬工人們的熱誠，才能保證生產力提高，若不能提高，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之最後的勝利是難以想像的。

黨的第二種成功是和黨的這第一種成功有不可分的聯系的。第二種成功就在表現於下邊的事實上。在去年一年之中，對於重工業大建設的基本問題，我們已得到滿意的解決，同時生產工具的總產額已加速的發展，關於轉變我們的國家為五金生產的區域也創造出了它的前提。過去十二個月的成功的意義就在資本家們所希望於蘇聯的已經完完全全的被打破了。不管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之公開的與秘密的財政封鎖如何，去年已經證明：我們並沒有把我們自己出賣給資本家，並且證明我們怎樣用自己的力量解決了資本積累的問題，建築了重工業方面的基礎。這是一個事實，就是工人階級最頑硬的敵人也無法再加以否認。

去年主要工業的投資有十六萬萬盧布，其中約有十三萬萬是投在重工業上，今年主要工業的投資有三十四萬萬之多，其中有二十五萬萬之多是投在重工業上——再進一步，去年大工業生產總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僅比重工業就增加百分之三十，今年生產總量據估計增加百分之三十二，重工業却增加百分之四十六，事實既是這樣，那麼，重工業發展的積累問題是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的，這豈不是明顯的嗎？

我們的重工業的發展是很快的，我們的落後早已勝過了，這難道還可懷疑麼？就

以上所述看來，去年的成績竟超過了五年計劃中的估計，五年中計劃之最高限度的實現性，在資產階級的臭學者則視爲「幻想的不可實現的」，在我們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派）胸中却覺得很可怕的，然而牠在實際上已經表現出是最低限度的實現性了，這難道還是奇怪的嗎？

過去的十二個月已經證明：黨在實現這一任務上很有成績，並且甚至克服了最嚴重的難關。這自然不是說工業的發展上將來不再有任何的困難了。發展重工業的任務，不僅因財政積累問題而感困難，而且同樣還遇到幹部的問題。這幹部問題就是爲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從工人階級隊伍之中，徵調許許多多忠實的技師與專家的問題，養成赤色技師與專家的問題。

就是資本積累問題可以解決大半，而幹部問題仍待解決。而且自工業上技術的建設看來，這個幹部問題是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因此，立刻抓住這個問題，一定要實行解決這個問題，便是黨的責任。

與第一個成功和第二個成功有密切關係的第三個成功，就在於我們農業的發展的根本改變，自個人農場的原始制度變化到集體農場，共同耕種，機器和電耕機的應用，勞動合作社和集體產業，這些都是根據最新式的耕種方法，因此最後發展到具有數百架電耕機和聯合機器的巨大的蘇維埃產業之更偉大的形式。

關於這一點，黨的偉大成功就是：黨使得許多鄉村的主要農民羣衆，自舊式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這一道路，只有少數富農和資本家們獲得利益，而大多數的農民僅能生活於窮困之中）轉變到社會主義發展的新式方法（這種方法，把富農消滅掉，給中農貧農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供給他們新式的器具，電耕機和農業機器，這樣就使得他們不再需要富農，仰賴富農，而且進到合作的和集體的耕種的道路）。雖然進行上有許多極大的困難和各種惡勢力——自教皇和富農起一直到黨的自己隊伍之中的庸俗的右傾的機會主義者——的拚命的抵抗，但是黨的這種成功就在於黨已經能夠把農民本身的這種根本變化組織起來，並取得中農和貧農廣大羣衆的領導權。

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引證幾個數目字。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場下的耕地面積共計一百四十二萬五千五百公頃（每公頃約合中國十六畝有餘），糧食生產總額計六萬萬米突磅（即十進位磅），而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共計一百三十九萬公頃，糧食生產總額計三萬五千萬米突磅。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農場的耕地面積共計一百八十一萬六千公頃，糧食生產總額計八萬萬米突磅，而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共計四百二十六萬二千公頃，糧食生產總額計十三萬萬米突磅。一九三〇年，據估計蘇維埃農場的耕地面積將達三百二十八萬公頃，糧食生產總額計十八萬萬米突磅，而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將達一千五百萬公頃，糧食生產總額計四十九萬萬米突磅。換句話說，就是來年蘇維

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生產的商品糧食合計總額佔我們所有農業生產總額的一半還多。

像這樣生氣勃勃的發展速率，甚至在社會主義的工業上也是沒有的，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無疑的也是開足速度向前飛跑的。因此，我們幼稚的社會主義農業是有偉大的前途，是能夠發展成爲奇蹟的，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至於集體農場發展的這種非常成功由於種種原因，無論如何，下列的原因是必須說明的。

這種成功首先要歸功於黨之執行列寧的教育羣衆的政策，用合作社的提倡、有系統的引導農民走向集體的耕種。這種成功也是由於黨能夠戰勝兩種不正確的傾向：一種，是誇大這種運動，主張以法令助長集體農場的發展（即「左派」唱高調的人們）。一種是阻止這種黨的行動的（即右派冷淡愚呆的人們）。

關於建設集體農場的這種非常的成功，也是由於蘇維埃的當局明確的認識了農民日漸需要新式器具，新式的技術，並且認識清楚在舊式耕種方法之下，農民的地位是毫無希望。因此，出借電耕機和農業機器，設立電耕機廠，組織共耕，建立集體農場並加以提倡，還有集體產業給農民一種普遍的扶助，這種種都及時的幫助了農民。一種政權，一種蘇維埃政權，已經興起，由行動上已經證明了這種政權是情願而且能夠有系統的繼續的幫助農民勞動羣衆，改善生產：這還是世界史上的第一次哩。以受工具缺乏

和一般能力的需要的農民勞動羣衆，一定要急切的抓住這種資助的，一定要加入集體農作的運動的，不是明顯的嗎？工人階級舊時的口號「向着鄉村！」，還應當以集體的農民的一個新口號「望着城市」，來補充，這難道是奇怪的嗎？

最後，集體農場的這種驚人的成功，是我們國家的進步工人已經把這件事拿在手裡的一種結果。我這裡所說的是指的那些四散在我們國家的主要區域內的幾百幾百的工人隊。從他們在農民羣衆之中的成功看來，集體農場之一切宣傳隊，最好的是工人宣傳隊。工人們已經說服了農民，使他們相信集體的農場比個人的小農場的利益大得多，特別由於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現實例證，更容易使他們這樣相信。這是毫不奇怪的。我們建設集體農場因為這樣纔會成功的，必定要把這種成功看爲是最近幾年來最重要的最決定的成功。

「科學家」們會懷疑組織五萬至十萬公頃田地的大規模糧食工廠之可能與必要，現在已經證明這種懷疑是多餘的了。在有私有土地權的資本主義國家，若不購買土地或交納絕對地租（這樣將要妨礙生產），大規模糧食工廠的組織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呢，却沒有這類限制，既不要繳絕對地租，也不要收買土地，因爲我們根本就沒有土地私有權的。因之，我們對於大規模糧食農場所的發展，是有更有利的條件的。

資本主義國家，大規模糧食農作企業是爲要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的目的，或者無論

如何，也是作為相當於所謂平均利潤率的一種利潤的目的的。我們却是另一種情形了，大規模糧食企業是國家的產業，對其發展，既不要最大限度的利潤，也不要平均利潤率，却能限制最小限度的利潤，或有時一點利潤都不要也可以管理，這是發展大規模耕種有利條件的另一事實。

最後，資本家們對於他們大規模糧食生產產業，既沒有信用制度的便利，也沒有輕易的特殊稅制度，而在有利於土地之社會主義化的蘇維埃秩序之下，這類特權，却是現在有，將來也不斷的有的。

右派機會主義（布哈林派）所說的一切謊言，說農民一定不加入集體農作，說集體農作的加速的發展，不能不引起羣衆的不滿，農民一定要脫離工人階級，說鄉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康莊大道」不是集體農作，而是合作社，說由於集體農場的建立，和向鄉村中資本主義成分的進攻，將容易使得麵包缺乏——這一切謊言，已經證實是虛妄的了，已經打得粉碎了，像舊時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胡言謔語一樣了。

農民已經加入集體農場了——而且有時，是整個鄉村，整個縣區的加入。集體農作的羣衆運動並未削弱勞動農民的聯盟，反倒加強了這種聯盟，並且供給了勞動農民們一種新的生產基礎。現在雖是瞎子也一定要承認農民是日漸走向新式集體農作，也一定要承認，假使農民之中有什麼不滿，這不是因為蘇維埃當局的集體農作政策引起

的，而倒是因為蘇維埃當局尚不能完全應付集體制度的發展與農民對機器與耕田機的需要。

關於鄉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康莊大道」爭論，是一個學院式爭論；是一個如藕泰華德（Eichwald）和斯列樸考夫（Stepkov）一類幼稚小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爭論。

這是明顯的，在沒有集體農作的羣衆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發展的原始形式，合作社和供給銷售聯合社，造成了這個「康莊大道」；然而到更進步的形式，集體農場的形式，出現了，那末，它就自動的代替原始的形式，而為社會主義化的主要路線了。鄉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大道是列甯的合作社計劃，包括農業合作社自最單純的以至最複雜精密的一切形式。要以集體制度來反對合作社，這是侮弄列甯，這是忽視他的批評。

現在雖是瞎子也一定看到，若不向鄉村中資本主義成分進攻，若沒有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發展，我們現在一定沒有今年糧食準備的任何成功，也沒有現在國家手中的這樣幾千萬普特的糧食。的確這倒可以斷言的，就是由於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運動的發展，我們究竟自糧食危機之中逐漸把我們自己解放出來了——如其以前還沒有解放的話。假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運動的發展更迅速些，那末，五年之後，我們國家將來一定無疑的，是世界上糧食生產國家最大的一個，即使不是唯一最大的。

關於現在集體農作運動的新而決定的事件，農民不是如從前一樣三一羣五一夥的加

入集體制度。而是整個的鄉村、整個的村落，或者整個的縣區，加入集體制度。這就是說中農也日漸加入這個運動了。這一點構成農業發展的根本變化的核心。這個農業的發展必須看作是過去十二個月最重要的成功。托洛斯基及其信徒們的孟塞維克的觀念，以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主要羣衆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已經證明打得粉碎而且證明是荒謬的觀念了。現在托洛斯基主義者自己也必須承認。現在，很明顯的，一切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的五年計劃的人們、或者不相信他們國家內有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的人們，是不配贊許這個計劃的。各國的資本家們最後希望，在蘇聯內恢復資本主義，「恢復私有財產的神聖原則」，已經毀壞無餘而等於零了。資本家把農民看做是資本主義園地的肥料，現在這羣人，全體廢除了「私有財產」的著名旗幟，而站在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基礎上了。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希望一天一天的煙消火滅了。

這一事實就解明了我們國家的資本主義成分、動員舊世界的一切勢力，反對社會主義的前進之絕望的企圖，這些企圖不過引起階級鬥爭之更加擴大而已。資本家明明曉得「怨恨」社會主義是徒然的。因此，資本主義的各式各樣的看家狗們，如斯特魯夫，黑森，米流考夫，克倫斯基，唐，阿伯拉摩維赤等，都發出了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狂暴呼號。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希望要永遠消滅了，這的確不是小事。列寧說過，如果能供給農民十萬架電耕機，中農也要一定加入共產主義運動的。去年已經證實了黨

向這一目的前進已得到成功。在一九三〇年春季，我們將要有六萬多架電耕機，一年之後，有十萬架，兩年之後有二十五萬架，這是大家知道的。

幾年前所視之爲「幻想的」，現在能以實現了，甚至於超過了。這就是中農所以轉向共產主義的緣故。

這一切都表明我們在工業化的道路上，開足速度走向社會主義，而且日漸脫離我們國家的一世紀之久的落後。我們將來成爲一個五金生產的國家，汽車和電耕機的國家。那末，讓那些誇稱他們的「文明」的資本家們追趕我們！那時，我們要看那些國是落後的，那些國是進步的罷！

軍閥混戰和汪精衛

瞿秋白

「革命已經成功，中國已經統一，三個月內肅清共產！」——蔣介石在去年六月間北伐軍到了北京之後，就這樣的說。中國資產階級的經濟會議，財政會議，鐵路會議，以及南京的所謂編道會議（裁兵會議），都在那半年之中，都表演着資產階級的「統一幻想」。國民黨中央的第五次全體會議，當然更是這種統一幻想的大廣告。那半年之中（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王正廷的外交政策之下，訂立了許多新的條約，求得了增加關稅。而且，最近兩年極大的革命鬥爭和反動屠殺之後，以及從廣東到直隸的連綿的戰爭之後，武漢的封鎖，上海天津之間北京漢口之間交通斷絕的情形，得着相當的變更；鉅大的戰爭暫時沒有。——於是中國經濟上比較鬆動，暫時表現着相當的改善，行市上的改善。帝國主義的列強承認南京政府；美國帝國主義方面，有許多「道威斯計劃」等款的傳說，許多大借款的呼聲，許多外國顧問和委員會到南京來。……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滿洲的張學良也插起了青天白日旗。國民黨「真正統一了全國」，得着了許多新的領袖——所謂北方軍閥，不但加入了國民黨，而且成了最早的忠實信徒，應當可以倒數過去首先反對赤化的功績；他們成了國民黨政治委員分會的主席（張學良）和黨國要人。所有這些情形，都散佈很多的國民黨的幻想，甚至於影響到共產

黨的队伍，產生機會主義復興的動搖和猶豫。機會主義者的論調，便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統治，現時已有相當的穩定，且在最近的將來，會有長足的發展」，「中國的南京政府已經是代表城市資產階級及鄉村富農而與買辦地主妥協的政府」，「中國的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特別在資產階級勝利以後，受着最後的打擊，現在只是殘餘的殘餘」；「因為過去革命的威嚇，及現時市場的需要，帝國主義是需要中國一時的和平，而不願即刻促成各派軍閥的混戰」；「所謂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要到來之『必不可免』字樣，用在估量現時鬥爭形勢決定策略時，是很唯心的定命思想。」

事實上，國民黨的統治——所謂資產階級的勝利——只不過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在帝國主義的贊助和指揮之下，暫時打退了工農羣衆革命的革命襲擊。只是「因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暫時比較的有力量，所以革命受着暫時的失敗」（史達林「論反對派」第六二四頁）。而中國資產階級，並沒有能夠解決引起中國革命的那些矛盾：（一）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只有更加深入，英日的勢力範圍和一切對華特權更加鞏固起來，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完全是欺騙羣衆的誑話；美國帝國主義對於南京政府的勾結，正是要取得中國的財政控制權及中國的一般經濟命脈，使中國變成他的完全殖民地；美國和英日的爭奪中國是世界第二大戰的中心問題之一；尤其明顯的表演着英美相爭世界的霸權；英日之間以及其他帝國主義的衝突，在英美的衝突的總形勢之下，只

有日益加強中國國民黨軍閥之間的相鬥和混戰，決沒有「帝國主義來維持中國一時的和平」的事；不但如此，帝國主義的列強，在中國革命暫時失敗之後，最容易利用中國國民黨的反動聯盟，做他們進攻蘇聯，及對蘇聯戰爭的工具之一。（二）中國封建地主的剝削和壓迫只有更加加重；一般的經濟發展在外國資本加強侵略之下，只能使積聚起來的資本多份投到封建式的土地私產上和商業高利資本上去；國民黨的甚麼土地稅法和二五減租的「改良草案」，沒有任何實際上的意義；一年多以來，只有繼續的清鄉屠殺，加緊實行保甲連保，拉夫拉車的軍事徵役；農業危機的深入和廣大的破產失業，只有更加增加高利資本和地主的剝削，很明顯的是資產階級努力在保持擁護這種封建式的秩序，並且自己更多的參加封建性的剝削；地主資產階級各種集團，在極端劇烈的經濟危機之下，互相爭奪這種剝削農民的份量，只有引起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而不會是努力保障甚麼「和平發展」——甚麼「地主之資本主義化」的萬里前程。（三）軍閥的基礎，原本是「中國經濟的特殊狀態：封建餘孽的統治和鄉村中商業資本的存在聯結起來，而保存着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封建式的剝削和壓迫方法」。這種基礎，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能加以打擊，並且對於他還在竭力保護和維持。中國沒有統一全國的國內市場，而只有經濟上政治上半獨立的區域（地方市場），這種情形一方面做帝國主義瓜分勢力範圍的基礎，別方面亦就是各該區域軍閥割據的條件；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之後

更加和封建地主混合生長的過程之中，首先就是在各個地方市場之內和軍閥政權的官僚機關更加親密的聯結起來。資產階級已經決不是和軍閥制度對抗的力量，而恰好相反，正是軍閥封建豪紳統治的新的工具，封建式的剝削壓迫方法的附屬——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固然必須依賴軍閥的保護，而且資產階級的資本更多份的投入商業，投入軍閥公債，使他和當地軍閥的關係日益密切。資產階級的某些集團之間的競爭，和當地豪紳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互相錯綜着，形成極複雜的軍閥政客各派各系經常互鬥的局面。這決不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階級鬥爭」，決不是所謂民權主義和封建制度的鬥爭，而是貫辦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營壘之中的內部鬥爭。至於所謂比較有力量的民族資產階級，事實上也不過上海區域（江浙）的資產階級，他占着國內最發達的市場，和經濟最優越的地位。可是，這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也只能在美國帝國主義的「門戶公開政策」之下，做帝國主義的附庸，用各種各式民族統一提倡國貨等的旗幟號召「反對割據的鬥爭」；其實，他只是給南京政府的軍閥以割據的體面招牌；上海資產階級和當地封建軍閥的聯盟，用這種「統一」的名義，要征服其他區域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事實上即使這種鬥爭裡包含着幾份上海資產階級統一國內市場的嘗試，即使這種鬥爭，表現着美國帝國主義排擠英日的對華勢力的矛盾，也只不過是各區域豪紳資產階級之間爭奪市場的鬥爭，亦就是英日美列強爭奪中國的鬥爭。這種鬥爭，決

不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能夠統一中國的鬥爭——這和世界帝國主義戰爭不是美國或者英國能夠統一世界的戰爭，是一樣的。正好是相反，南京和各地軍閥之間的混戰，各區域軍閥之間的自相混戰，正反映着：世界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在中國有多大劇烈的表演，中國各區域軍閥之間的衝突，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內部各種集團之間的鬥爭，是怎樣的劇烈，他們的內部矛盾是怎樣的嚴重。

中國的這些主要問題，民族解放，土地革命和國家統一的任務，不但是國民黨的反動所不能解決，並且是更加緊迫起來。青天白日旗插遍中國的時候，正是中國軍閥混戰重新開始的日子。中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之中，工人階級已經是唯一的能夠統一中國解放中國的階級，他的革命勢力，和他所領導起來的農民戰爭，既然受着帝國主義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摧殘。那末，在英日美帝國主義互相爭奪和侵略之下，在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加重的剝削壓迫之下，在各派各系的反動勢力互相衝突競爭之下，中國的軍閥混戰是必定不可避免的，中國的統一絕對不可能的。——只有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了農民羣衆，把這種軍閥混戰，變成爲反對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戰爭，而得着革命的勝利，然後中國的統一方才能够實現，這就是要農民羣衆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根本剷除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根基而解放中國。